

反革命两面派张国焘

(续一)

于吉楠

二、追随陈独秀，搞投降主义

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张国焘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本质是极右的，他伪装“左派”，打着革命的旗号来反对革命的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当着不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就不能前进时，张国焘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用关门主义来帮助阶级敌人的；在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潮流日益高涨的形势下，搞投降主义便成为张国焘反对革命的主要策略。这样一来，他的右派真面目也就原形毕露了。

一九二五年，从上海掀起的五卅运动，迅速扩展到各地，形成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高潮，揭开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大革命的洪流一泻汪洋。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趋尖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成为党内的主要危险。一向反对国共合作的张国焘，突然对联合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右派，异乎寻常地“热心”起来，成了陈独秀搞投降主义的左右手。

五卅运动后期，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国民党右派，加紧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七月，戴季陶主义出笼。十一月，谢持、邹鲁、林森等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联合国民党左派，向国民党右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国民党右派承了帝国主义意旨，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对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必须给以坚决的回击，右派从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并不足以阻挠国民革命，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

当时，形势十分有利，可是陈独秀却错误地估计形势。他悲观地认为，郭松令部倒戈失败，奉系军阀气焰复张，冯玉祥的国民军四面受敌，这就是革命低潮到来了，害怕我们党的力量大了，吓跑了资产阶级，因此，主张在革命统一战线中实行让步政策。他公开鼓吹“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固然应该和国民党左派结亲密的联盟，无论

在党内或党外，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

张国焘跟着陈独秀，亦步亦趋，极力推行“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机会主义策略。国民党右派头面人物戴季陶、孙科等人，从广州被赶出来，处境狼狈，张国焘和陈独秀却在上海，同他们谈判，拉拉扯扯，订立了可耻的退让协定。在完成了这笔叛卖交易之后，张国焘于十二月二十日，发表致国民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宣称：“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他负着为工农阶级斗争的特别使命，可是中国此时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计，为无产阶级的初步利益计，也就毅然决然的自愿在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一致进行国民革命的工作”。这同陈独秀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

“投降代表”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对我党不断发动猖狂进攻，掀起新的反共逆流。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自愿放弃领导权，节节退让，张国焘充当陈独秀的“投降代表”，作了一次又一次的丑恶表演。

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前，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陈延年等同志计议，要在会上团结左派，打击右派，使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中央机关占绝对优势，以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陈独秀却顽固反对，一定要请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回广州开会，多次给广东区委写信，强调必须退让，指名要把蒋介石、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头目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促进“团结”，还特地选派张国焘为“钦差大臣”去广州，推行这一机会主义策略。张国焘下车伊始，就大肆宣扬退让是绝对必要的谬论，污蔑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犯了“过左”的偏向，压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向右派让步。

大会开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员，抵制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方针，联合国民党左派，经过激烈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右派势力，开除了邹鲁、谢持等人的党籍，给林森等人以书面警告，责令戴季陶反省，会议开得很激烈。但是，张国焘极力推行陈独秀的让步政策，使大会在选举时受到了影响。由于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自动退让，在选出的六十个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仅占十四人，而蒋介石等右派却在国民党中央占了优势，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会后，张国焘回到上海，歪曲事实真相，制造假团结的气氛，欺骗舆论，于二月十日在《响导》周报上发表文章，硬说“所有参加这次大会的人们，没有一个不承认全体代表都在孙总理遗嘱遗像之下，充满革命精神之中，进行这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大会。一切宣言和决议，都在以至诚之意接受总理遗嘱之下，根据孙总理的主义和政纲，以最大多数的投票而决定的”。

但是，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刚刚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的蒋介石，便利用窃取的权力，向我们党发动了猖狂进攻，制造了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污蔑“共产党阴谋暴动”，突然出动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扣押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五十多人。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代表我们党的正确路线，主

张把一切反蒋的力量集中起来，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并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周恩来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当天上午，立即赶到扣押着共产党员的广东造币厂，当面痛斥蒋介石制造反革命事件、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蒋介石理屈词穷，不得不将关押的人全部释放。那时，蒋介石的实力并不很大，他还没有控制国民政府，在国民革命军中也是孤立的，而工农运动都掌握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并且拥有二千多工人武装纠察队，还可以调动黄埔学生军，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是可以粉碎的。然而，陈独秀拒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胡说中山舰事件是由于共产党员过于“急进”，包办国民党事务太多，“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而我们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又不可能压倒蒋介石，因此，除了继续退让之外，没有别的路可走，提出了“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荒谬主张。并且极力吹捧蒋介石是“左派领袖”，胡说“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甚至叫嚷谁反对蒋介石，谁就是“反革命”。

四月初，陈独秀再次派张国焘赶赴广州，去执行这一妥协退让政策。张国焘一面蛮横地压制共产党员只许退让，不准反击；一面跑去“探望”蒋介石，“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奴颜卑膝，无以复加。这样，就帮助蒋介石在政治上占了上风，顺利地篡夺了军权，更加助长了他的反革命气焰。

五月十五日，蒋介石得寸进尺，又以“消释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一，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共产党对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先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通过。这个反动提案公布以后，遭到毛泽东同志和党内其他同志的坚决反对，陈独秀却完全同意，胡说什么这是国民党的“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并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共产党“包办”的嫌疑，“有利”于两党团结，下令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张国焘秉承陈独秀的旨意，在会前同蒋介石秘密谈判，达成“谅解”，然后在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会议上，极力兜售这一反动提案，不顾大家的激烈反对，使用极其恶劣的手法，强行签字接受。结果，让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组织部长、军人部长，轻而易举地篡夺了领导大权，为以后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政变做好了准备。

张国焘完成他的“投降代表”的使命以后，溜回上海，向陈独秀报功去了。但是，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犯下的严重罪行，却永远刻记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反对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军从广州誓师北伐。北伐战争和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相结合，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占领了长江流域。

在革命胜利向前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潜伏着严重的危机。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磨刀霍霍，反革命面目已经昭然若揭。就在这个时候，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等人，反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在上海召开第三次中央扩大执委会议，通过一系列的投降主义的决议，把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全党。

为了粉碎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中共广东区委的负责同志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在北伐战争中对蒋介石应当采取怎样的方针。陈独秀借故推托，不予回答，由张国焘出面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他故弄玄虚地说：我们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使大家莫名其妙，无所适从，实际上是帮助了蒋介石。不久，蒋介石就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助长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搞投降主义的张国焘，却被陈独秀提拔为中央常委和湖北省委书记，叛卖活动更加猖狂了。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在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光辉思想指引下，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继续高涨。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我们党只有坚决支持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才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叛变，挽救中国革命。但是，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一贯否定农民、不准农民革命的张国焘，这时，更加疯狂地反对农民运动。他恶毒攻击湖南农民运动“左倾”，叫嚷这样下去，“要出乱子”，必须“纠正偏差”。当时，国民党在湖南右派头目、大恶霸地主刘岳峙，组织“保产党”，伪称“左社”，猖狂反对农民运动。他攻击农民运动“赤化”，污蔑农运干部是“地痞流氓”，要农民和地主“联络感情”，“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鼓吹由国民党管辖农民协会，如不“服从纪律”则“分别改组处究”。毛泽东同志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过程中，点名批判了刘岳峙的反动谬论；以共产党员和左派为主体的国民党省、市党部，决定查办“左社”，永远开除刘岳峙等人的党籍。张国焘对这件事大为恼火，公然为刘岳峙鸣冤叫屈，极力赞扬刘岳峙的反革命的“农运计划”，胡说刘岳峙是“著名的左派”，攻击开除刘是粗暴地破坏了国共合作政策，赤裸裸地暴露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

“马日事变”以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已迫在眉睫，广大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武装保卫革命的号召，为挽救革命进行着紧张的战斗。张国焘紧跟陈独秀，顽固地坚持投降主义路线。六月二十八日，在陈独秀的指使下，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将全部枪支弹药交给了国民党。三十日，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召开党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

这个彻底出卖中国革命的投降书通过之后，张国焘在汉口向国民党记者发表公开谈话，无耻地宣称：“现在的形势很险恶，这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应该负责任的，民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了我们主观的力量与客观的要求，弄得不易驾驭，又引起了当局的反感。现在不能不采取退却的步骤，不退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恶毒地攻击工农运动“过火”，并叫嚷“如果要想和国民党合作，就不应这样过火”，“昨天中央已经决定将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的武装自动交出一部分来。以后，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实一些”。他还自欺欺人地说：“据我看来，武汉的局面，可以因为我们的退却而稳定下去”。

局势的发展同叛徒的梦呓恰恰相反，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压制工农运动、解除工农武装，只能更加助长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南昌起义中的叛卖活动

我们党从大革命的失败中，得了惨痛的教训，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七月中旬，在毛泽东同志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委派周恩来同志为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的书记。这时，陈独秀遭到广大党员的唾弃，已经靠边站了；张国焘钻进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推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在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的时候，七月二十七日，张国焘以临时中央代表的身分，由武汉赶到九江，妄图阻止南昌起义。他一下船，就急忙把前委委员恽代英，青年团中央委员贺昌、关向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等同志找来开会，借口情况变化，别有用心地提出重新讨论是否要发动南昌起义。大家看穿了张国焘的祸心，纷纷表示坚决反对。恽代英同志愤怒地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谁要阻止南昌暴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张国焘碰了一鼻子灰，仍不死心，又跑上庐山去拉拢张发奎。张发奎已经叛变革命，正在同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孙科等人开紧急会议，秘密商定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严令贺龙、叶挺部队撤回九江，并通缉恽代英等同志。九江街头，白色恐怖笼罩，反动军警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在这种紧急的形势下，当时，在二方面军任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秘密来到九江，把一封十万火急的秘密信件交给党组织。信中说，张发奎靠不住了，对他不能抱任何幻想；反动的庐山会议，已作出捕杀共产党人的决定，希望把握局势，尽快起义。同时，通知还留在九江的同志迅速转移。可是，张国焘不顾这一切，于七月二十九日早晨和中午，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前委，说什么：“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须等他到南昌后再作决定，实际上配合了张发奎的反共活动。周恩来同志和前委其他同志，根据当时的紧迫形势和实际情况，认为起义决不能停止，决定仍按原定计划进行，没有理睬张国焘的那一套。

七月三十日晨，张国焘从九江坐火车赶到南昌。当天，前敌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会议开始以后，张国焘抢先发言，大放厥词，说什么“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否则不能动”。他胡说张发奎是国民党左派，“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亦不可动”，部队可以随张发奎回广东去，或者共产党员退出部队去搞地方工作，免得树大招风。张国焘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制止南昌起义，把我们党掌握的军队拱手交给国民党反动派。在这严重时刻，周恩来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痛斥了张国焘投降主义的反动谬论。他指出，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的言行，是完全违背党中央派我到南昌组织和领导起义的原意的。现在，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从敌我力量对比看，完全有成功的把握。我们决不能拖延时间，更不能幻想得到张发奎的支持后再举行起义，因为张发奎亲汪反共的态度已经暴露无遗。他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退出部队，不能把枪交出去，相反，我们要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还是干！起义决不能推

迟，更不能停止！周恩来同志的正确主张，得到前委其他同志的一致赞成。恽代英、彭湃等同志接连发言，怒斥张国焘，指出，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根本没有什么讨论的余地，蒋介石、汪精卫就是利用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猖狂进攻，使我们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这个血的教训，我们不能忘记，必须立即举行武装起义。恽代英同志还义正词严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你要继续动摇人心，我们就要把你开除出去。张国焘狼狈不堪，十分孤立。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原定三十日举行起义的时间被推迟了。

第二天，前委会议继续进行。张国焘理屈词穷，玩弄新的花招，反对起义的领导机构发表宣言和政治纲领，要求只作为一次“兵变”，偃旗息鼓地回广东去。周恩来等同志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是武装夺取政权，不是“兵变”，一定要公开宣布我们的政治纲领和宣言。张国焘又无理取闹，借口宣言写的不好，要由他修改，继续拖延时间。周恩来同志识破了张国焘的险恶用心，愤怒地说：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宣言由我来改！经过这场激烈的斗争，张国焘破坏南昌起义的阴谋，终于被粉碎了，前委决定，起义改在八月一日凌晨举行。这是周恩来等同志坚持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陈独秀、张国焘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取得的光辉胜利。

八月一日，在周恩来同志以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城头升起革命红旗。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军退出南昌，向广东进发。一路上，张国焘并没有停止破坏和捣乱，他利用窃取的农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在土地条例上大作文章，反对实行土地革命。本来土地革命是南昌起义的主要社会内容，沿途就要实行，张国焘顽固坚持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炮制了一个所谓只“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的条例，遭到大多数同志的反对。因此，八月十九日，起义军攻占瑞金后，前委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条例”，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但是，八月二十八日，部队到上杭时，张国焘又进行反扑，胡说要保护小地主的利益，改头换面地抛出另一个“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的方案，经过激烈的争论，再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第二天，恰好广东省委送来一份没收三十亩至五十亩以上地主土地的政纲，这个土地政纲已经在当地公开宣传了。张国焘乘机翻案，召集会议，强行通过了“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方案。由于张国焘的干扰，土地政纲陷于无休止的争论之中，使土地革命根本无法实行。

九月二十四日，起义军占领汕头后，留下部分兵力驻守潮、汕，主力继续西进，不久在同优势敌军的战斗中失败了。这时，张太雷同志从上海赶来汕头，召集领导同志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命令张国焘立即返回中央；一切工作由周恩来同志负责处理；其他同志迅速转移。当时，周恩来同志身染重病，高烧达四十度，他临危不惧，为革命挑起了重担。而那个阴险狡诈的张国焘，在危急关头，只顾自己逃命，不惜危害组织和同志。有一天，正在开会时，忽然传来断续的枪声，大家发觉情况不对头，想派人出去查看，张国焘灵机一动急忙说：“我去，你们等着，我就回来。”他出去后，过了十几分钟还不见回来，而枪声却更加激烈了。大家出门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军队在帝国主义炮舰掩护下登陆，向这里冲过来，情况十分危急，出去查看情况的张国焘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张太雷同志立即带领大家从屋旁的一条狭巷里，迅速转移出去，才转危为安。

屡教不改 蒙混过关

张国焘推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破坏南昌起义的罪行，激起党内广大同志的无比愤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张太雷同志在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强烈要求党中央严肃处理。张国焘毫无悔改之意，于十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信，狡辩抵赖，反诬张太雷同志“不是记忆错误，或传闻失真，便有点故入人罪”；叫嚷“对于那次暴动取‘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临时中央政治局严词驳斥了张国焘的诡辩，并决定开除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

在这以后，张国焘仍然拒绝党的教育，继续同陈独秀搞在一起，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动立场。陈独秀被撤销了中央领导职务以后，住在上海，午文弄墨，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正确路线，鼓吹取消革命的谬论。他恶毒攻击“农民的原始暴动和游击战争，只是反动的无政府的行动”，叫嚷“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鼓吹用“四不”（不缴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的口号，来取代土地革命。张国焘同陈独秀秘密往来，一唱一和，反对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胡说现在要“休养生息”，等待将来“再图大举”，进行机会主义的派别活动。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清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批判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确定新形势下党的任务，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坚持反动立场，没有出席；张国焘作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在大会上受到了批判。张国焘表面上不得不承认犯了“错误”，但背地里又在捣鬼，拉拢少数人，进行小组织活动，向党进攻，态度极为恶劣。

因此，“六大”以后，张国焘被留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他以学习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张国焘软磨硬泡了三年之久，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反而又犯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参加莫斯科中山大学少数中国学生的反党小组织活动，而这种小组织是同托洛茨基派相勾结的。

那几年，党内路线斗争迭起，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垮台以后，一九三〇年出现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在立三路线破产的时候，王明反党宗派集团又猖狂地进行篡夺党中央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张国焘认为这是他混水摸鱼、东山再起的极好时机，于是几次写悔过书，急不可待地要求回国“工作”。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在一次会议上，张国焘宣读了承认错误的声明书，并表示：“自然承认错误不应当只是口头上的，应当在实际工作上来证明。中国党现在正在最紧急的时机，要巩固党必须实行坚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右反‘左’，反对一切国民党式的纠纷小团体斗争。这样才能实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然而，这不过是两面派玩弄的一场骗局。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政治上的两面派乃是一伙毫无宗旨的政治野心家，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民方面的信任，于是就采用欺骗的方法，采用蜥蜴变色的方法，采用拐骗的方法——随便采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来企图重新博得信任，只求为自己保持着政治活动家的资格”。

张国焘蒙混过关，起程回国了。他回国后的历史证明，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阶级本性，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待续）